

新學衡

· 第二辑 ·

主編 朱慶葆 孫江

N E W C R I T I C A L R E V I E W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新學衡

· 第二辑 ·

主编 朱庆葆 孙江

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

New Critical Review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学衡.第二辑/朱庆葆,孙江主编.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7.9

ISBN 978-7-305-19059-9

I.①新… II.①朱…②孙… III.①学衡派-研究
IV.①I2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80299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
出 版 人 金鑫荣

书 名 新学衡(第二辑)

主 编 朱庆葆 孙 江

责任编辑 陈蕴敏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

开 本 900×1280 1/16 印张 15.75 字数 342 千

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5-19059-9

定 价 45.00 元
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官方微博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
官方微信 njupress

销售热线 (025)83594756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《新学衡》编委会

编 委（按姓氏拼音排序）：

陈谦平 杜骏飞 胡大平 孔繁斌 闫小波 沈卫威 唐正东

王明生 王守仁 王月清 吴 俊 徐小跃 徐兴无 颜世安

杨金才 张伯伟 张凤阳 张 生 周晓虹

主 编：朱庆葆 孙 江

副 主 编：李里峰 李恭忠 武黎嵩

主编助理：王 楠 宋逸炜

目 录

南高学人

- 民国史学中的南高学派(吴忠良) 003
- 柳诒徵与梁启超:文化史观与文明史观的碰撞
——解读柳诒徵先生《中国文化史》(武黎嵩) 022
- 景昌极先生传略(谢任) 034
- 鲍鼎先生传略(宋逸炜) 042

特邀演讲

- 西方关于“自由”的论辩(昆廷·斯金纳) 051
- 我即档案!——媒介、记忆和不确定性(安德鲁·霍斯金斯) 066

新潮·旧潮

- 中国内地首位天主教徒的临终洗礼及身后传奇
——兼论天主教在华早期传教的一些特点(宋黎明) 079
- 章太炎与南方话语
——章太炎影响下的清末革命青年(林少阳) 094
- 从清华到东海:美籍教员麻伦的中国之缘(陈怀宇) 124
- 欲问江流与湖水,可能洗尽古今愁?
——“莫愁”符号与南京历史文化气质(胡箫白) 161
-

南 雍 艺 海

白門行(柳詒徵) 181

游天戏海心太平

——曾熙先生的书法艺术(李昕垚) 186

西 洋 镜 像

歌曲、革命政治与民族记忆

——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政治音乐(罗宇维) 193

启蒙之外,地图之上

——启蒙时代的文本、图像与政治(于京东) 207

书 评

记忆之场:皮埃尔·诺拉与法兰西民族记忆(胡才惠心) 225

南高学人

新学衡

民国史学中的南高学派*

吴忠良**

民国史学灿烂无比,流派众多。学派研究也成为现代学术史书写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。一般而言,将一群人称为学派的,多他者指称,少群体自诩。南高学派之名,亦为他者指称。以命名方式来看,当下学派主要有以下几类:以刊物为名,如国粹派、学衡派、古史辨派和食货派等;以学校或科研院所为名,如南高学派、北大新文化派之类;以治学方法分类,如史料派、史观派、信古派、疑古派和释古派等。南高学派即以学校为名,且“南高”之名亦为南高学派诸人所珍视。而在民国时期诸多学术流派中,南高学派独树一帜,与学衡派声气相通,与胡适、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多有学术论争,缘是之故,多受新派人士指摘,其后的学术史书写也多将其边缘化,或置之于学衡派之内^①。本文无意抹杀诸多学者对学衡派研究的贡献,事实上他们的研究也有助于推进南高学派的研究。

一、学术史上缺席的南高学派

民国学术史版图中的南高学派,在当下出版的民国学术史著述中,较少有人注意到或者论述过。他们之所以在民国学术史中缺席,尚未引起研究者广泛重视,主要是因为有意无意被同化于学衡派之内,同时也与其个人学术成就遮蔽了学派的光芒有很大关系。事实上,南高学人群体有其自我期许和团体意识,此一现象已为学界所注意。如桑兵认为:“当时东南大学的《学衡》公然树旗,与当时的北大派分庭抗礼,形成所谓‘南高学派’。”^②周文玖认为:“20年代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系,办了多种史学杂志,如《史地学报》、《学衡》等,培养了大量史学人才,其研治史学,在国内独树一帜,被称为‘南高学派’。”^③另有学者将南高学群称为史地学派或史地学报派^④。笔者曾将南高学群界定为南高史地学派,随着研究和思考的深入,现将其界定为南高学派,认为该学派以柳诒徵为领袖,以陈训慈、缪凤林、张其昀、郑鹤声和向达等人为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(12CZS001)成果之一。

**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。

① 如郑师渠《在欧化与国粹之间: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》(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年)、沈卫威《“学衡派”谱系——历史与叙事》(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2007年),均将柳诒徵等人归入学衡派来论述。

② 桑兵:《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》,《历史研究》1999年第3期,第24—41页。

③ 周文玖:《从梁启超到白寿彝——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学术系谱》,《回族研究》2005年第2期。

④ 区志坚称之为“史地学派”(区志坚:《书评:柳诒徵评传》,《人文中国学报》1997年第3期,香港浸会大学编辑出版),而彭明辉则称之为“史地学报派”(《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》“凡例”,台北: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,1995年),并将之界定为“常在《史地学报》发表论著的史地研究会会员,以及担任史地研究会指导员的教授们,包括柳诒徵、竺可桢、徐则陵、张其昀、郑鹤声、陈训慈、刘挾葵、向达等人”。

核心,萌芽于南高史地研究会时期,形成于1928年前后,消解于1949年。

学界先进与笔者之所以会将该学群称为史地学派或史地学报派,很大程度上源于该学群最早创建的刊物《史地学报》及他们当时倡导的研究史地之学,而该学群有一个人员分化和研究方向凝练的过程。关于此点,郑鹤声有过形象的描述:

1928年后,南京为首都所在,群贤毕至,时柳师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(在清凉山),竺师担任南京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(在鸡鸣山),两处职员多是南高、东大史地两系毕业同学,其时南京各学校机关亦多两系同学,不下数十人,群议宴请柳、竺两师以为寿。柳师笑对竺师说:“我们两个大王,各聚一个山头,各拥有喽罗若干人,势力不可谓不雄厚,我们应如何作出打击计划,各成大事。”竺师笑对柳师说:“我们打天下各有范围,至于如何打法也有不同,总之我们应当用科学方法循序渐进,立业而后成功,不能躐等而进。”^①

柳诒徵的“我们两个大王,各聚一个山头,各拥有喽罗若干人”和竺可桢的“我们打天下各有范围”实已道明:南高史地研究会时期的南高学群经过数年聚散离合,此时已在学术上走向成熟,以各自研究方向为基础,分别聚集在柳诒徵和竺可桢门下。这也可以从他们创办的刊物和学会名称,还有1928年这一重要年份来佐证。

南高学派最早创办的刊物是《史地学报》,是南高史地研究会的学生刊物,关注的是史地学研究;继《史地学报》之后创办的刊物是1926年的《史学与地学》,是南高学派的中国史地学会的同人刊物;其后的《史学杂志》出版于1929年,是南高学派的南京中国史学会的同人刊物,而此前的1928年张其昀在中央大学创办了《地学杂志》,关于此段因缘,柳诒徵在《史学杂志》发刊辞中都有所交代^②。正是基于此,我们认为,南高学派在1928年前后已经形成。虽然学界前辈在论述相关问题时对南高学派有所提及,但并未详论,故有必要在此对该学派的内涵和外延等进行界定。

南高学派的内涵。在治学路向上,南高学派致力于“昌明国粹,融化新知”,宗奉通史致用,力主为学当有益于世,追求求真与致用的统一。该治学路向明显不同于胡适和傅斯年等人所倡导的为学只当求真。学术理念不一致,也导致双方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多有争论。

南高学派的外延。南高学派以柳诒徵为领袖,在其个人魅力和学术感召下,“柳门成荫”。其弟子陈训慈、缪凤林、郑鹤声、向达、张其昀、刘掞藜、王焕镛、王庸、束世澂、王玉璋等人之间多有互动,且都卓然成家,是南高学派的代表人物。正因为该学派以师生关系为纽带,是一“师承性学派”,所以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和紧密性,成员流动性很小。

① 郑鹤声:《记柳翼谋老师》,柳曾符、柳佳编:《劬堂学记》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2年,第105—106页。

② 柳诒徵称:“往借诸生倡《史地学报》,嗣又倡《史学与地学》,皆骈列史地,犹昆弟孪生者然。去年张子其昀倡《地学杂志》于大学,今年缪(凤林)、范(希曾)、陈(训慈)、郑(鹤声)诸子又与张子倡《史学杂志》,盖孪生之子自毁齿而象勺,虽同几席而专其简策之通轨也。”参见《史学杂志》1929年第1卷第1期,第1页。

南高学派的盟友与对手方。学派是一个分类的概念,既然是分类,一般都会有同类和不同类之分,如此才能体现出学派特色。由于学术理念的异同,我们将学衡派和钱穆、蒙文通等学者视为南高学派的盟友,而胡适、傅斯年和顾颉刚等学者所在学派则为南高学派的对手方。

必须说明的是,南高学派不是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一特定阶段相对应的学术流派。南高师存在于1915—1923年,而南高学派成员的活动却绝不限于此时段之内。它可以说萌芽于1920年的地学研究会,经过史地研究会和中国史地学会阶段的融合与淬炼,最终于1928年形成一个稳定的学派。1949年后,由于诸多因素,南高学派成员星散四方,难以互通声气,学派自动消解。柳诒徵的个人魅力和相似的文化认同,是这一学派维持至1949年的关键所在。

二、南高学派不同于学衡派

柳诒徵是《学衡》杂志最主要发起人之一,因其之故,南高学派中的缪凤林、景昌极和张其昀等人都有文章刊载其中,尤其是柳诒徵、景昌极和缪凤林,更是《学衡》稿件的重要来源,是吴宓之外发文最多的三人。正是因为这种深度关联,钱基博对柳诒徵和《学衡》产生了这样的印象:“丹徒柳诒徵,不徇众好,以为古人古书,不可轻疑;又得美国留学生胡先骕、梅光迪、吴宓辈以自辅,刊《学衡》杂志,盛言人文教育,以排难胡适过重知识论之弊。一时之反北大派者归望焉。”^①以柳诒徵为核心,梅光迪、吴宓等人协助创办《学衡》,此种形象描述有过誉之嫌^②,但也点明了梅、吴等人对柳诒徵心悦诚服之因在于“古人古书,不可轻疑”。“古人古书”关涉的是中国传统文化,或曰国学,而《学衡》宗旨是“昌明国粹,融化新知”。纵观吴宓等人在《学衡》上所刊文章,皆关乎西学,少有关乎“国粹”之文字,而肩负起“昌明国粹”重任的恰是柳诒徵及其弟子们。柳诒徵的《中国文化史》即连载于《学衡》杂志,这无疑让《学衡》的学术意味更加厚实。之所以会出现此种情状,与他们的学术背景有很大关系。

以柳诒徵和吴宓为例。柳诒徵一生浸淫于传统学问,师事缪荃孙,且与诸多传统学人相互往还,吴宓认为其国学造诣与梁启超相颉颃^③;而吴宓虽然也对传统学问兴趣浓厚,但国学根底实浅。吴宓在1919年求学哈佛之际,曾慨叹自己于“中国学问,毫无根底,虽自幼孜孜,仍不免于浪掷光阴”,只能暗下决心“回国后,作事之外,日必专以短时,治中西学问。若现今之鄙陋,不登于大雅之堂,仅普通学生之程度”^④。及后与孙德谦和张尔田二人交流,更是“恨不早二十年遇孙、张二先生,则不至嬉游无事,虚度光阴,而国学早已小有成就”^⑤。正是这种对国学的向往,使得吴宓易于和柳诒徵等人交往。加之柳诒徵虽治中学,但并不排斥西学,其治学

① 曹毓英选编:《钱基博学术论著选》,武汉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7年,第18页。

② 吴宓将《学衡》视为自己一生之事业,在其日记中多有相关记载,如其1927年10月12日日记记道:“《学衡》为我之事业,人知我以《学衡》。故当冒万难而竭死力,继续办理,不使停刊。”见吴宓:《吴宓日记》第3册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98年,第419页。

③ 见柳曾符、柳佳编:《劬堂学记》,第312页。

④ 《吴宓日记》第2册,1998年,第28页。

⑤ 《吴宓日记》第2册,第250页。

显得“宏通博雅”，“并识西学西理西俗西政，能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”^①，这又使得柳诒徵易于和吴宓等留洋之人交往。基于柳诒徵和吴宓等人的交谊，南高学派中人多有文章刊发于《学衡》，如缪凤林和景昌极等人还为《学衡》杂志捐款，柳诒徵也为了《学衡》的运营竭尽全力。可以说，南高学派深度介入了《学衡》事宜。

虽然如此，我们还是将南高学派和学衡派视为盟友关系，而不是将其同化于学衡派之内。因为《学衡》杂志不等于学衡派，而且两派之间存在明显差异。试以他们创办的《史地学报》与《学衡》为例加以说明。

首先是两者的专业性质不同而具有互补性。一般来说，《学衡》的内容比较偏重于文学和思想文化方面，范围显得较大一些。^②《学衡》的宗旨是：“论究学术，阐求真理，昌明国粹，融化新知。以中正之眼光，行批评之职事，无偏无党，不激不随。”为标示其中西平衡、客观平情的办刊宗旨，《学衡》杂志在国学与西学体裁方面有详细说明：“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，为精确之研究，然后整理而条析之，明其源流，著其旨要。以见吾国文化，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，而后来学者，得有研究之津梁，探索之正轨，不至望洋兴叹，劳而无功，或盲肆攻击，专图毁弃，而自以为得也”；“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，深窥底奥，然后明白辨析，审慎取择，庶使吾国学子，潜心研究，兼收并览，不至道听途说，呼号标榜，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。”很显然，学衡派于调适中西学问之外，学术批评也是其致力之一方向，而且矛头直指新文化运动中人。而《史地学报》则以研究史学与地学为宗旨^③，治学之范围与《学衡》相较，则要小得多，并且相对而言缺少一种批判精神^④。这种刊物宗旨和治学范围方面的差异，从南高学派成员在两刊物上的发稿情况也可看得很清楚。如徐震堉在《史地学报》仅发文1篇，而在《学衡》则发文6篇。同样，缪凤林在《学衡》杂志上刊载的文章也远多于在《史地学报》上刊发者。这与他们的文章类型有很大关系。徐震堉在《学衡》杂志上所刊文章，除了译文以外就是词，而词在《史地学报》上没有

① 《吴宓日记》第2册，第250页。

② 如吴宓在论及学衡派敌对者时，就很自然地从事文学角度加以区分：“与《学衡》杂志敌对者，为（一）上海‘文学研究会’之茅盾（沈雁冰）一派。茅盾时在商务印书馆，任《小说月报》总编辑。（二）上海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学灯》之编辑邵力子一派。至于（三）上海创造社郭沫若一派，则在1923年始兴起，故与《学衡》杂志无直接对辩及论争。”吴宓著，吴学昭整理：《吴宓自编年谱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95年，第235页。

③ 南高学派认为，各种学问“靡不有所凭于史地，而史地之可贵，亦要在出其研几所得，供各学科之致用”，而当时国内学界情状是：国人盛言西学，谈论著述，蔚为大观；于真实之学，则畏避无已，史学地学，尤稀过问；“新说之灌输无闻，旧籍之研究日荒，怀古例人，宁非大耻。同人等问学旨趣，偏此二学，心痛现状，爰布兹册”。见《编辑要则》，《史地学报》1922年第1卷第3期。他们后来创办的刊物也多两者并重，如《史学与地学》《史学杂志》《史地杂志》等。

④ 《学衡》创刊伊始，就对新文化运动的诸多问题展开批评，如梅光迪的《评提倡新文化者》（《学衡》1922年第1期）、《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》、《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》，吴宓的《论新文化运动》（《学衡》第4期），胡先骕的《评〈尝试集〉》（《学衡》1922年第1期）、《论批评家之责任》（《学衡》1922年第3期），等等。梅光迪后来回忆《学衡》创刊宗旨时也指出：“学衡杂志者，以‘阐扬旧学，灌输新知’为职志，对于一切流行褊激之主张，时施针砭。”见梅光迪：《九年后的回忆》，梅光迪著，罗岗、陈春艳编：《梅光迪文录》，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47页。而在《史地学报》上，这种旗帜鲜明的批评文章则少得多，仅有柳诒徵的《论近人言诸子之学者之失》（《史地学报》1921年第1卷第1期）、《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》（《史地学报》1924年第3卷第1、2合期），刘挾蓼的《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》（《史地学报》1924年第3卷第1、2合期）、《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第二书》（《史地学报》1924年第3卷第3期），等等。这也说明，《学衡》的批判性是一贯的，而《史地学报》并未以学术批评为职事。

专栏。缪凤林的情况也是如此。1923年南高毕业后,他入南京支那内学院,从欧阳竟无习佛学,所撰文章开始与佛理有关,这一风格也与《史地学报》杂志不符。而《学衡》杂志对此类稿件却没有什么额外限制,只要与“昌明国粹,融化新知”有关,它都可以刊登。只是史学方面的文章,有时显得比较勉强。如对于张其昀的《论刘知几与章实斋》,吴宓就“嫌其为考古述学之专著,无关国事与时局”。郑鹤声所投之《汉隋间之史学》和《唐以后之史学》,尽管柳诒徵评价甚高,但吴宓却以其“皆罗列材料,而乏义理”,“本拟摈弃不登者,今特编入,以图充塞篇幅而已”。^①这显然与两者不同的学科背景有相当关系。这类学生习作能刊入《学衡》,多少是看在柳诒徵分上。柳诒徵曾担任《学衡》杂志总干事,且曾撰写《学衡》发刊词,在《学衡》社中有很高地位。《学衡》社后期的许多事业,吴宓是与柳诒徵商议后开展的。也许是出于对柳诒徵的敬重,吴宓对史地成员的某些投稿虽有不满,但仍尽量刊发。不过,透过吴宓和柳诒徵对某些稿件的不同评价,我们也颇可从中看到两人乃至《史地学报》和《学衡》杂志的不同风格 and 特点。

其次,二者的作者群存在很大差异,而此种差异恰也决定了两个学派内部的稳定性的不同。《史地学报》的作者群比较单一,基本上以史地研究会成员和指导员为主,核心人员则是与柳诒徵关系紧密的陈训慈、缪凤林、张其昀、郑鹤声、刘挾蓁、向达等人,偶有校外来稿;抛开运作资金等因素,在稿源上有相当高的稳定性。而《学衡》则恰恰相反,稿源非常不稳定,作者群亦显得颇为庞杂。不计南高学派成员,除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之外,尚有一批旧式学者,如林损、黄节、孙德谦等人,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部分师生,作者人数在百人以上。如此庞杂之队伍,仅以宗旨相吸引,很难维系其学派内部的稳定性,吴宓创刊之艰难、无人相助也可为证。而南高学派则并非纯以宗旨相号召,更多以师生感情为纽带,以真挚的师生感情和教师的高尚人格魅力为感召,较好地将众多史地学才俊团结在柳诒徵周围,学派的稳定性相当高,即使成员星散各地,依旧互通声气。与此同时,其成员还经常通过集会等方式,相互交流学术,共商进止。

再次,是新人文主义宣传上的巨大差别。学衡派和南高学派都很推崇白璧德(Irving Babbitt)的新人文主义。如梅光迪认为,白璧德之学“以综合西方自希腊以来贤哲及东方孔、佛之说而成,虽多取材往古,然实独具创见,自为一家之言,而于近世各种时尚之偏激主张多所否认”^②。柳诒徵则因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之赞赏和了解,将梅光迪视为白璧德学说在华的最早宣传者,而吴宓“为亚洲建一新希腊,亦华之白璧德矣”,“二者各以一身肩吾国文教之责,使东西圣哲之学说炳焕无既”。^③尽管如此,我们细究两份刊物所登载之文章,就会发现《史地学报》专以史学地学研究为目标,并未有人在《史地学报》上发文介绍白璧德及其新人文主义^④;

① 《吴宓自编年谱》,第228、234页。

② 梅光迪:《现今西洋人文主义》,《学衡》1922年第8期。

③ 柳诒徵:《送吴雨僧之奉天序》,《学衡》1924年第33期。

④ 直接介绍的有徐震堉翻译的《白璧德释人文主义》(刊于《学衡》1924年第34期)、张其昀的《白璧德——当代一人师》(刊于《思想与时代》1948年第46期),更多则是散见于南高学派同人著述之中。

而《学衡》则恰与之相反,创刊初始就明确标榜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^①,其“创办宗旨就是要宣传您(引者注:白璧德)的思想理念和儒家学说”^②。相关文章,如胡先骕的《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》(第3期)、梅光迪的《现今西洋人文主义》(第8期)、张荫麟的《白璧德论班达与法国思想》(第74期)。着力最多者为吴宓,不仅有《白璧德之人文主义》(第19期)、《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》(第32期)、《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》(第38期)、《白璧德论今后诗之趋势》(第72期)等文,且在有关新人文主义的译文前撰写编者按语,对新人文主义进行阐发。^③1928年夏,梁实秋告诉吴宓,“上海似乎很有一些人不知道白璧德的,更有一些人知道白璧德而没有读过他的书的,还更有一些人没有读过他的书而竟攻击他的”^④,从而促使吴宓将《中西人文教育谈》《白璧德之人文主义》《论民治与领袖》《释人文主义》《论欧亚两洲文化》5篇文章结集为《白璧德与人文主义》,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。1946年10月21日,吴宓在接受《中华人报》记者采访时坦承:“予半身精力,瘁于《学衡》杂志,知我罪我,请视此书。大体思想及讲学宗旨,遵依美国白璧德教授及穆尔先生之新人文主义。”^⑤此类夫子自道,一方面展现了《学衡》杂志在吴宓学术生命中的重要性,另外一方面则展现了吴宓对于白璧德及其新人文主义之深深服膺^⑥。

复次,学衡诸人如吴宓、陈寅恪等人不是史学意义上的南高学派,除了前述几大理念差异之外,还在于民族主义立场上的差异。学衡自然也有民族主义立场,只是在史学研究上他们更注重求真。如陈寅恪,他在研究唐代兴盛与外族关系时指出:“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,然详究其所以与某甲外族竞争,卒致胜利之原因,实不仅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,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,而为之先导者也。国人治史者于发扬赞美先民之功业时,往往忽略此点,是既有违学术探求真实之旨,且非史家陈述覆辙,以供鉴戒之意。”^⑦而南高学派于史学求真之外,更注重经世致用。如柳诒徵和缪凤林诸人,就对史学致用一途再三致意。

最后,在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上,虽然二者都持一定的批判态度,但在《学衡》这一被胡适称为“学骂”的杂志上,两派学人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。学衡派中人多有文章批评新文化运动,如梅光迪有《评提倡新文化者》《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》《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》等文,

① 白璧德与学衡派的关系,可参见王晴佳:《白璧德与“学衡派”——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》,朱庆葆、孙江主编:《新学衡(第一辑)》,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6年,第3—32页。

② 吴学昭编:《吴宓书信集》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1年,第36—37页。

③ 比如,吴宓在《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》(《学衡》1922年第3期)编者按语中对白璧德生平及学说做了简要介绍,认为“其学精深博大,成一家言。西洋古今各国文学而外,兼通政术哲理,又娴熟梵文及巴利文,于佛学深造有得”;在《穆尔论现今美国之新文学》(《学衡》1928年第63期)按语中则指出,“欲窥西方文明之真际及享受今日西方最高之理想者”,不可不读穆尔撰写的有关新人文主义的著述。

④ 梁实秋:《白璧德与人文主义·序》,上海:新月书店,1929年。

⑤ 李继凯、刘瑞春:《追忆吴宓》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1年,第469页。

⑥ 吴宓的这种感情是真挚、热诚的,绝不虚伪。除了在文章中推崇、阐扬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,在其私人空间“日记”中也对其师推崇有加。在1937年的日记中,吴宓曾述及白璧德对他一生学术、思想的影响:“宓服膺白璧德师甚至,以为白师乃今世之苏格拉底、孔子、耶稣、释迦。我得遇白师,受其教诲,既于精神资所感发,复于学术窥其全真,此乃吾生最幸之遭遇。虽谓宓今略具价值,悉由白师所赐予者可也。”《吴宓日记》第6册,1998年,第96页。

⑦ 陈寅恪: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1年,第322页。

胡先骕有《评〈尝试集〉》《评胡适〈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〉》《论批评家之责任》《文学之标准》等，吴宓则有《论新文化运动》《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》《我之人生观》等文；而南高学派同人文章则多为中国文化史、史学史等专题研究，如柳诒徵的《中国文化史》《华化渐被史》，郑鹤声的《汉隋间之史学》，缪凤林的《中国民族西来辨》，等等。此外，在《史地学报》刊发的文章中，我们也未见专门批评新文化运动之文。虽然在《文哲学报》上有文章论及，但针对的也是新旧文学观念和主张方面的歧义，而不是新文化运动本身。缪凤林的《文学上之摹仿与创造》，针对的是胡适所主张的文学创作中的“不摹仿古人”^①，《文德篇》针对的是胡适将文言文视为死文学^②。

总之，南高学派和学衡派并不能完全等同。南高学派深度参与了《学衡》事宜，而学衡派基本上没有参与南高学派的相关事宜，如吴宓、梅光迪等人并未曾为《史地学报》提供稿源，亦未曾担任史地研究会指导教师，后期的一些学会和刊物创办也多未见吴宓等人踪影。而且，两派关注的领域也有很大不同。南高学派更多关注的是史学，其会刊所设栏目皆与此有关，成员的研究领域也以史学为主，并以柳诒徵倡导的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；而学衡派则更多地关注文学和大文化领域，故《学衡》所设栏目以文学和文化哲学类为多，这也可以从郑师渠《在欧化与国粹之间：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》一书8章内容中史学思想仅为1章窥见一二。因此，严格说来，南高学派和学衡派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术流派，前者纯为史学流派，后者则更多地属于思想文化流派。虽然这两派的观念乃至人员有所交叉，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两者间的区别。

三、南高学派对手方

南高学派对手方是以胡适为首的北大派。柳诒徵、缪凤林等人与胡适、顾颉刚和傅斯年之间多有学术论争，除古史论战多有互动外，另外的论争大多是单向的，是为未成交锋的交锋。计有几次：

1. 缪凤林《评胡适〈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〉》。1919年2月，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卷上）出版，不到两个月就再版，其受欢迎程度可以想见。缪凤林曾在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上发表《评胡适〈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〉》一文，对胡著多有推许，以为“适之先生此篇，开人无数法门，可以说是出版界中一个新纪元”，“此书条理清楚，纲领很是完备”，“尤难得的，就是各家学说连穿的叙述：譬如讲到名实，把各家关于名实的意思，略略提及，讲到进化论也是如此。……既可以明白各家学说的同异，并得相互比较其短长，真是一大优点”。优点之外，缪凤林认为胡著“缺少老孔以前的哲学”，“书名是‘中国古代哲学史’，不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，两者是有分别的。本书第二章目录，是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，并不是中国哲学家思想发达的时代”，“我国到了老孔的时代，已臻很盛，前乎此必有哲学”^③，“讲中国哲学史，如把他截去，真是数典

① 缪凤林：《文学上之摹仿与创造》，《东方杂志》1921年第18卷12号。

② 缪凤林说：“岂知文学之可贵端在其永久性，本无新旧之可分。古人文之佳者，光焰万丈，行且与天壤共存。”《文德篇》，《学衡》1922年第3期。胡适所论，见其致朱经农信。

③ 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，1920年7月17日，第四版。

忘祖了”^①。双方治学之差异,此时已经初显。而顾颉刚恰为胡适截断众流,从东周开讲,而非如陈汉章那样从上古讲起所折服。

2. 国文教授及教本。《中学国文的教授》为胡适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国文研究部的演说词,完成于1920年3月24日,登载于《教育丛刊》和《新青年》等杂志。文中,胡适以一个“门外汉”的身份,对中学国文教授的目的、内容、教材和教授法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,因为“门外汉”没有那些教育专家的专业限制,他“思想比较自由些,也许有时还能供给一点新鲜的意见,意外的参考资料”^②。关于《中学国文的教授》,胡适自称“我拟的中学国文课程中最容易引起反对的,大概就在古文教材的范围与分量”^③;而缪凤林恰认为“那文最促人注意的,就是古文教材的范围和分量”,“要想真正改革现有的社会,非根据历史的研究,寻出他的弊端,对症下药不可,那就非读古书不行”。^④另外,胡适主张国文教材中的小说用选本,缪凤林认为此举大为不妥:“先生对于小说,主张用 expurgated edition(删节版)来做科本,比到禁看的办法,自胜一筹,可是仍逃不出塞住耳朵吃海蜇的弊病。《水浒》将潘金莲一段删改了,难道学生就不去买 original edition(原版)了吗?我并不是反对 expurgated edition,乃是说这也不是彻底的办法。我以为这个时期,(学生)性欲极炽,用消极的方法来防制,不如用积极的训育来诱导。教者于此,最好将生理上的道理,和心理上的关系,向学生凯切详明的讲道,使他明白其中的厉害。”^⑤此时的缪凤林尚为南高师学生,其建议考虑到学生的心理与生理,自有其合理之处,而此点恰可能是身处导师位置的胡适很容易忽略的。

3. 柳诒徵和缪凤林驳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”。关于诸子是否出于王官,胡适认为:“古代定无王官可言,《周礼》伪书本不足据”,“《周礼》本刘歆伪书,歆特自神其书,故妄以诸子之学为皆出于周官耳”。^⑥而柳诒徵恰恰生平最佩服《周礼》,认为中国文化典章制度俱出于此,其《中国文化史》上编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在阐述周代之制,重视程度可以想见。他直言自己“生平最佩服《周礼》这部书,以为是中国政治的根本,后来多少政治家,小小有点成绩的,都是从《周礼》出来”^⑦。双方立场之差异,泾渭分明。所以,柳诒徵才会认为胡适“论学之大病,在诬古而武断,一心以为儒家托古改制,举古书一概抹杀”,“盖合于胡氏之理想者,言之津津,不合于其理想者,不痛诋之,则讳言之,此其著书立说之方法也。依此方法,故可断定曰古无学术。古无学术,故王官无学术;王官无学术,故诸子之学决不出于王官”。^⑧缪凤林则于1922年4月在《学

① 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,1920年7月30日,第四版。

② 欧阳哲生编:《胡适文集2 胡适文存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3年,第139页。

③ 欧阳哲生编:《胡适文集2 胡适文存》,第144页。

④ 缪凤林:《对于适之先生“中学国文的教授”问题的讨论——回复适之先生的一封信》,《时事新报》1920年9月15日,第1版。

⑤ 缪凤林:《对于适之先生“中学国文的教授”问题的讨论——回复适之先生的一封信》,《时事新报》1920年9月15日,第2版。

⑥ 胡适:《诸子不出于王官论》,《太平洋杂志》1917年第1卷第7号。该语不见于后出之《诸子不出于王官论》,可参见刘巍:《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》,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第183—184页。

⑦ 柳诒徵:《从历史上求民族复兴之路》,《国风》半月刊1934年第5卷第1期。

⑧ 柳诒徵:《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》,《史地学报》1921年第1卷第1期。

衡》第四期发表《评胡氏〈诸子不出于王官论〉》，认为胡适该文“任举一义，皆有罅漏”。缪氏指出，《七略》失传已久，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犹存，学者欲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舍此别无他途。胡适著《诸子不出于王官论》，抨击刘歆、班固论诸子之说，斥其为昏谬，貌似创见，意实诬古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时缪凤林对胡适论点的评价不再是开始的褒贬互见了。1921年7月31日，胡适看到柳文后，认为柳氏“立脚点已错，故不能有讨论的余地”^①。此时的胡适，俨然已经有了评判者的意味。

4. 古史论战。顾颉刚在《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》提出“层累地造成的古史”说，并疑禹为虫^②。刘掞藜对顾颉刚的论据，尤其是否定大禹存在的说法，逐条进行反驳，认为顾颉刚引《说文解字》字义假定禹为九鼎上一种动物之说太不慎重：“这种说文迷，想入非非，任情臆造底附会，真是奇得骇人了！我骇了以后一想，或者顾君一时忘却古来名字假借之说。不然，我们要问稷为形声字，是五谷之长，何以不认后稷为植物咧？难道那奇形怪状底象物九鼎上没有稷这种植物么？九鼎上的动物——禹——流传到后来成了真的人王，何以不说稷为九鼎上的植物，流传到后来成了周的祖宗呢？”^③其后二人再度论学，但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。在顾颉刚邀请下，胡适写了《古史讨论的读后感》为顾氏助威，文中称誉顾颉刚的“层累地造成的古史”说是对当时史学界的一大贡献：“颉刚的‘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’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。中国的古史是逐渐地，层累地堆砌起来的——‘譬如积薪，后来居上’——这是决无可讳的事实。……在中国古史学上，崔述是第一次革命，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，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。”由此，胡适认为刘掞藜的治学方法和一些结论，简直“是全无历史演进眼光的臆说”。他指出，刘掞藜所谓“决之以证”固然很好，但“度之以情”和“验之以理”却是很危险的，因为“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里，从证据里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”，如以今人之“情”与“理”去揣度古史，就必然会掺杂自己的成见，从而使得“决之以证”也不免为主观意见所左右。事实上，胡适自己也曾私下主张过以“情”与“理”去揣度古史^④。于此，其实也可见胡适的双重态度。最后，胡适希望刘掞藜对“自己治史学的方法有一种自觉的评判”，对“自己搜来的材料也有一种较深刻的评判”，而不是“奋勇替几个传说的古圣王作辩护士”。两相比照，胡适对顾颉刚的维护不

① 曹伯言整理：《胡适日记全编》第3册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407页。

② 关于顾颉刚和疑古运动，可参见 Laurence A. Schneider, *Ku Chieh-Kang and China's New History* (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71)、许冠三《新史学九十年》(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1986年)、王汎森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——一个思想史的分析》(台北：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，1987年)、彭明辉《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》(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91年)、陈志明《顾颉刚的疑古史学》(台北：商鼎文化出版社，1993年)、顾潮、顾洪《顾颉刚评传》(南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1995年)、刘俐娜《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》(北京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1999年)、吴少铭、赵金昭《二十世纪疑古思潮》(北京：学苑出版社，2003年)、张京华《古史辨派与现代学术走向》(厦门：厦门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)等。一般论文和博硕士论文很多，兹不赘述。

③ 刘掞藜：《读顾颉刚君〈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〉的疑问》，顾颉刚编：《古史辨》第1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87页。

④ 胡适1921年8月13日日记云：“做历史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科学——严格的评判史料，一方面是艺术——大胆的想像力。史料总不会齐全的，往往有一段，无一段，又有一段。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，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像力来填补了。”曹伯言整理：《胡适日记全编》第3册，第431页。只是，胡适在公开场合强调的多是实证的态度与方法，反对推断和想象。